

2019.06.08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十五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编辑吴译凡。

此外，本期还将另行刊出《互联网的“另一半”》，讲述休闲如何推动互联网在贫穷世界的使用。敬请关注。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内陆与沿海的较量	1-5
2. 茶馆专栏：中国审理全球之案	6-10

内陆与沿海的较量

吴译凡译

发自白关

中国区域之间贫富差异再次拉大

李志国（音）的工厂挂了条横幅：在厂里努力挣钱，别让家里人瞧不起。鼓动人心的标语大概没有比这更干脆的了。他自豪地举起自己的产品：一件红色的薄纱裙子，袖子上带着褶皱。成批的裙子已经打包好，等待运输。

从表面上看，如此场景应该能让中国的领导人欣慰。李先生的工厂位于湖南省中部的白关镇，这是一个贫穷的小镇。长期以来，官方希望刺激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办法之一就是让那些低端产业从富饶的沿海地区迁出，搬到类似于白关一样的地方。李先生所在工厂，从资金、管理人员到机器都是从沿海迁来。他说：“在这里设厂有优势，招工更容易。”

但稍微深究一些，问题就来了。李先生的目标是拿到足够的订单，招一百名工人全力开工。但由于生意不景气，他只招了原计划一半的人手。三年前，白关工业园落成，当地政府将其誉为中国新的纺织业之都。如今，园区内到处散布着空荡荡的建筑。此地工人的工资可能比不上沿海，但是和柬埔寨、孟加拉国的工人相比，则绰绰有余。园区售楼处的

房顶已经部分坍塌，经理们时常抱怨停电的状况。

在湖南发展纺织业所遇到的困难只是问题的一角，真正的挑战要大得多，涉及缩小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差距。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沿海地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而其他地区发展则更为缓慢。政府最终开始聚焦更贫穷的地区。二十年前的这个月，中国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计划，2004 年又出台的针对中部的类似计划。这些计划要在公路、铁路、学校及医院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同时还要激励企业和工人往内地走。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些工作取得了胜利。这种说法部分属实。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内陆地区的增长出现飙升。但眼下某种转变又悄然出现。内地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沿海地区，尤其是南方沿海，其增速正在超越中国其它大部分地区。这种现象在其它国家再熟悉不过了：富裕的地区把贫穷的地区甩得越来越远。中共曾对缩小贫富差异的工作引以为豪，而上述现象却又让其深感不安。

中国南方的沿海地区包括上海以及从江苏到海南的五个省。该区域有中国大陆最繁忙的四个港口，包括上海及科技中心深圳。这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人均 GDP 达到近 10 万人民币（约 1.5 万美元）。当政府往内地投入大量资金时，南方沿海起初是处于下风。从 2003 年到 2013 年，该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从 36% 跌到了 33%。但从那以后，其相

对财富值又有所恢复。2018 年，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恢复到 35%，为近十年来最高。

受公有制遗产的拖累，表现最糟的是东北。以北京为中心的北部沿海则有点踉踉跄跄，部分是限制污染的政策所致。西部和中部的表现要好得多，诸如成都、武汉等城市可谓蓬勃发展。但总体上看，西部和中部逼近南方沿海的趋势已经停止。按名义值计算，在中国经济过去十年增速放缓的过程中，内陆跌幅是沿海地区的两倍。

而潜在的状况可能更让人忧虑。在南方沿海，财政赤字（政府收入与开销的差额）持续处于低位，从 2000 年的 2% 增长到如今的 3.9%。而西部及中部的赤字却快速增长，从 2000 年的 5.5% 增加到 15.5%。卖地财政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维持着这些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但随着增速的下降也将逐渐减弱。

财富变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投资流动。2000 年，修建公路、铁路及工厂约占据各地区 GDP 的三分之一。到了 2015 年，由于政府蓄力推动内陆发展，该比例变为南方沿海 43%，西部 68%，中部 60%。而随着内陆投资的缩水，这些地区的增速也开始波动。

资金使用得当的地方，更容易适应投资的减少。中部地区的武汉就应该会受益。该地是中国着力打造半导体产业的中心。而举措不当的城市就会遇到麻烦，西部的重庆就是一

例。重庆着力吸引汽车及计算机制造商，但是随着这两种产品销量的削减，重庆的经济也开始下滑。重庆从中国发展最迅猛的城市，蜕变为增速最慢地方之一，增速从 2010 年的 17% 下降到去年的 6%。当地一家小装修店的女销售员廖丽说：“人人都说我们遇到金融危机了”。重庆的情况当然没那么糟糕，但增速的放缓确实是突如其来。

南方沿海的诸多工业也遇到了麻烦，从江苏的造船业到广东的制衣业，但这些地区的经济都更加多样化，也更有韧性。从软件制造到财富管理的现代服务业也更加强劲，而且仍是工业的发动机。这些地区的很多工业制造商广泛采用自动化技术，小企业也进行了改造。有学者估计中国 77% 的“淘宝村”——得名于他们的主要销售收入来源的平台淘宝——都位于南方沿海。

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南方沿海的优势有可能增加。该区域很适合发展知识化的经济，其专利申请量占全国总数的一半。据咨询公司穆迪分析，自 2015 年以来，南方沿海工人的生产率以每年 7.4% 的速度递增，超过中国其它地区。而官方数据显示，2017 年，该地区吸收了境外直接投资的 87.5%。不少外企管理者认为，南方的营商环境更好。一位前不久在广东启动了一个大项目的欧洲高管称，广州就像一个矿泉疗养地。而该企业此前在内陆遭受挫折。

赴内陆开设工厂，一个常被提及的动因就是工资水平较

低。但中国内陆工人通常也比东南亚国家拿得多：是相对贫穷的越南等国的两倍，比相对富裕的如泰国也多出十分之一。而同美国贸易战却又像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原本可能从沿海迁到内陆的企业纷纷放眼海外。工业活动占内地经济的份额下跌速度较沿海更为迅速。例如在西部，从 2011 年占 GDP 的 51% 下跌到了去年的 41%。

中国的领导人不会放弃。在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宣布缩减区域之间的差异仍是关键目标。地方官员仍然尝试实现这样的目标。距白关希望之中的纺织中心仅一小时车程的株洲，官方已经打造了一个“动力谷”，希望当地能成为铁路、汽车及飞机等工业的制造基地。这是一个精心营造的区域，有簇新的厂房，一条写着“美丽智慧城”的标语，还一座运营园区的高大的政府大楼。

但自从开张近四年来，“动力谷”显然动力不足。接待处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园区有八成的入驻率。而就在她的门外，半个街区的办公室都空着。跟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家汽车设计公司企业租住了较大的厂房。该公司的经理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的公司得到了免除五年租金的优惠。十名雇员就占了总共四层楼。他说：“我们在努力追赶沿海。”但这场竞赛似乎已经输了。

茶馆专栏：中国审理全球之案

罗轻舟 译

新设立的商事法庭渴望能与西方的类似法庭相匹敌，已从审慎的始点出发了。

公平、专业和高效这三个词语组成了中国商事法庭（以下简称商事法庭）的任务说明，今年 5 月 29 日法庭举行了首次公开审理。茶馆专栏的记者旁听了审理，外国的外交官们和中国最高法院的官方代表们一同旁听了审理。中国最新的司法建制之法庭的门厅由青铜和大理石装点，门厅的醒目位置悬挂了电子显示屏，前述的三个愿景词的中英文字样在上面闪闪发光。

因商事法庭之宏大雄心，其设立引人注目。设立商事法庭是为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计划（“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习近平主席于 2013 发起的横跨全球的计划）的铁路、公路和光缆建设，也支持了某种不那么显眼的东西的：即一种法律应该如何管理全球化的商业事务的独特的中国视角。商事法庭有两个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设立于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西安。叮叮作响和哧哧呼吸的骆驼队所行走的，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商道，正是以西安作为其历史性终点。第二商事法庭的姐妹法庭即第一商事法庭位于南方的新兴城市深圳，该庭将审理与习近平的前述倡议的海上航路有关之纠纷。尽管排场颇大，新的商事法庭具有不确定的未来，有关将有多少企业使用到商事法庭之忧虑给其蒙上了阴影，尽管现在其管辖范围延伸到了涉及外国企业的大型纠纷，而

不仅只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交易。这种忧虑和为共产党领导人所珍视，但是在法庭大楼内的电子显示屏上漏掉了的第四个词语相关：控制。

为实现控制之欲求，官员们在起草商事法庭的规则时极其谨慎。近年来处理国际商事案件的其他司法机构开设地区包括迪拜到新加坡和荷兰等地。为了表明其独立性，这些机构通常从好几个国家雇佣法官。利用中国最高法院渴望使其司法系统更加练达人情实务和训练有素的心理，律师界的翘楚们劝说中国最高法院在设立新的商事法庭时考虑类似的大胆举措。但中国立法机构的官员们拒绝修改法律以准许外国法官坐在中国新设立的商事法庭内审案。相反，商事法庭将从最高法院借人审案。尽管英文书证被允许作为证据出示，商事法庭的庭审将由中国的法律执业者以中文进行。

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商事法庭属于最高法院的一部分。商事法庭委任了大部分是外国人的 32 人组成“专家委员会”。但是他们的角色仅仅是向法庭提出建议，以及在涉案各方偏好避免诉讼时参与调解。委员会的法国籍成员陶景洲是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在一篇新近的文章中痛惜商事法庭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

单文华是商事法庭的另一名专家委员，他在西安的商事法庭开放日回答了本刊记者的提问。单文华教授是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他向本刊记者保证商事法庭的中国法官会“独立行使审

判权，不受任何干扰”。他带着肯定的语气将中国新设立的商事法庭与伦敦或新加坡的商事法庭、仲裁庭进行了比较，他特别提到中国的商事法庭将为当事人提供仲裁、规范的诉讼或调解之选择权，三者均可在商事法庭这一个屋檐下进行。在回答中国官方媒体的问题时，单教授走得更远，他解释到，中国商人在“一带一路”国家面临“重大风险”，某些“一带一路”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具备“比较高”的质量。他说，此外，不得不依赖外国的法律制度这一事实“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称”，“我们有机会建立更好的制度”。

相较于理解带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法律可能会是什么样这件事，领会在商事法庭上中国的野心之程度要更容易一些。今年三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向人大做了最高法院的年度工作报告。报告的第一项是誓言拥护共产党对中国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因为中国反对司法独立，称司法独立是西方错误思潮。周强还要求严格落实法官向共产党的领导请示报告重大事项之规定。范思深 (Susan Finder) 是商事法庭的专家成员之一，她在其颇具影响力的个人博客“最高人民法院观察” (Supreme People's Court Monitor) 上写到，周强的这些意见引发了外界对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新设立之商事法庭的质疑。

有更多的涉外案件在中国大陆审理的某些动机也许在相当程度上是体贴的。例如，中国独断专行的商业领导们，特别是来自国有企业的领导们，厌恶在外国的商事法庭或仲裁庭受到交叉

询问，而且通常他们在庭上的表现很糟糕。其他可能存在的动机更让人担忧。非常之多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商业合约是密不示人的、不平等的，以及是以不透明的方式对当地的权力掮客进行奖赏，这反映出中方对全球规范的深层次怀疑。某些专家考虑到是否中国悄悄地嫉妒美国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对地球另一边的涉案方的财产具有没收之能力。尽管中国官员斥责美国法院的手伸得太长的行径属于霸凌主义，一些学者想知道是否中国也许会在某天开始实施更多的域外管辖审判。

法律的长手

眼下，国际化的法律专家们希望发达国家的各方提防中国的商事法庭。他们预计外国企业将偏好将其与中国合作方之间的纠纷提交到如香港这样的折中地点来让外国法官（译者按：香港法院系统有大量的英联邦国家退休法官在港从事审判业务）进行审理，香港是中国的一座城市，有其自己的法律体系。西安的第二商事法庭的开门案件涉及中方企业与泰国的功能饮料商“泰国红牛”之间的股权纠纷。该案由最高法院流转到第二商事法庭审理。一名具有多年中国法律实务经验的律师说到，“你到哪里去解决纠纷或多或少事关自身的谈判能力”。穷国的小型企业只有很少的选择机会。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法庭里，权力和政治控制比公平重要。商事法庭有一天会变得非常重要，会被用于出口一种国际法的中国视域，这种视域反映出同样晦暗的世界观。到了那时，对权力和

秩序的执念将阻碍新设的商事法庭之发展。但是此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也许不会永远像现在那样笨拙。